

宋路霞 著

上海滩

望豪门
族

Shanghaitan
Haomen
Wangzu

学林出版社

I25

S770

上海滩
望豪门

宋路霞 著
Shanghai
Haomen
Wangzu



学林出版社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滩豪门望族 / 宋路霞著. —上海: 学林出版社,
2004.1

ISBN 7-80668-637-1

I. 上 ... II. 宋 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9005 号

上海滩豪门望族



作 者——宋路霞
特约编辑——任余白
责任编辑——钱丽明
摄 影——宋路平
封面设计——鲁继德
责任监制——田振军
出 版——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)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发 行——上海发行所
学林图书发行部(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)
电话: 64515012 传真: 64844088
印 刷——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开 本——640 × 965 1/16
印 张——17.75
字 数——23.9 万
版 次——2004 年 1 月第 1 版
200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印 数——8001—13000 册
书 号——ISBN 7-80668-637-1/I · 185
定 价——25.00 元

目 录

剑气霜花

——张静江家族百年轶事……………1

龙门风雨

——周馥家族商海沉浮记……………53

江南儒商

——刘镛家族的实业与文化……………101

何园沧桑

——何汝持家族五代传奇……………154

大隆春秋

——严裕棠家族海上创业记……………208

乱世豪门

——周宗良家族洋场兴衰记……………247

剑气霜花

——张静江家族百年轶事

浔溪河边的两处豪宅

位于太湖南岸的湖州南浔镇，是个被湖风和渔歌浸润得温馨的小镇。小镇上河网交叉，古桥隆然，户户人家枕河而居。若不是节假日或是黄金周，这儿依然是桃花园般的宁静。

小镇的南西街由南而北，与一条穿城而过的小河笔直地为邻。那街的最南头靠近小莲庄的拐角处，有一处高墙深院。那院墙上的门楼足有两丈高，一半临河，一半沿街，清一色的粉墙黛瓦，在河边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，上面还缀着大红灯笼——这就是有着“江南第一宅”之誉的南浔张家——张静江家族。然而这还只是其中的一处（张家长房的故居），即张静江的堂兄张石铭（钧衡）的旧宅“懿德堂”。

沿南西街继续北行，走到东大街折向东，在靠近著名的明



张家故居中的
芭蕉厅

剑气霜花

清古建筑群“百间楼”的河边，抬头又可见另一处张家的豪宅，即张家二房的故居——“民国奇人”张静江家的“尊德堂”。入得门来，只见幽深的正厅里高敞肃穆，红木桌椅被抹得锃亮，堂上悬挂着当年孙中山先生为张静江书写的对联：“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剑霜寒四十州”，令人顿生无限感慨。正厅的右侧有一长长的、窄窄的、光线幽暗的过弄，伸向更加幽深的重重内院。

这两处张家旧宅现均被列入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建筑，东边的叫“张静江故居”，南边的叫“张石铭旧宅”，而当地的老百姓仍习用旧称，一处叫“张家东号”，一处叫“张家南号”，而文献记载上往往称“南浔张家”或“张恒和”。

对于江南一带上了年纪的人或是文化人来说，“南浔张家”，实在是个很亲切的称呼，因为这个家族很美——不仅这两座共计近万平方米的大宅院美，几乎无处不雕花，无处不是景；还在于那些从青石板、漏窗格和中西各式砖雕的门楼里层层弥漫出来的、整整飘逸了一个世纪的江南人文气息。这种气息不仅熏陶了文化人，也熏陶了一代革命党人。以至于一位外国游客在参观了张家旧宅后留言说：“这是我们在中国江南见



张静江旧居的
正厅“尊德堂”



到的最美、最好、最大的民宅，这座大宅本身就是一部书。”

“大象”起步于糕团店

南浔人有南浔人的幽默，把发了财的富户依家财多少，分别唤作“大象”、“骆驼”和“小黄狗”。依南浔之富，家财一百万两银只能屈居“小黄狗”，而要当“大象”，就得赚上一千万两银！

南浔历来是渔米之乡，家家户户世代植桑养蚕，所产“辑里丝”在明朝初年就已“名甲天下”，到清代初期，已经出现了世代从事蚕丝贸易的丝业世家。鸦片战争之后，南浔“辑里丝”已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，尤其是法国妇女，视“辑里丝”为上等奢侈品。尚未“五口通商”时，南浔丝商只能经过广州商人，把丝运到广州再行出口；上海开埠之后，可就近经运河和

张家老爷、南浔“四象”之一张颂贤（居中）和他的儿子张定甫（左一）、孙子张静江（右一）、张弁群（右二）、张澹如（左二）

太湖，到上海进行贸易了。成本的降低带来更加丰厚的利润，致使南浔镇上的居民，大半都围着丝业转了。这种行情，就必然吸引并诞生一批著名的丝业商人。南浔张家，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，于明末从安徽休宁迁居浙江，于清康熙末年在南浔镇定居下来，又在鸦片战争之后大发其财的。

张家定居南浔的第一代祖先叫张振先，起初是开糕团店的小老板，后来积累了些资金，又开了小酱盐店，到了张振先的曾孙张颂贤（1817—1892），即张静江的祖父手里，家已略积资金，于是聘请了得力的“丝通事”，在镇上丝行林立的丝行埭开设了恒和丝行，从此全力经营“辑里丝”。不数年，张家又挺进上海，在上海的洋泾浜桥一带设丝行，于南浔坐庄收货，上海行销货，与洋行里的买办联手做生意。由于经营得当，同治年间，张家已跃为镇上巨富。

张颂贤收得“盐票”打天下

在张颂贤三十来岁的时候，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。太平军横扫浙江的时候，各地官府一片混乱，“小乱住城，大乱居乡”，大家望风而逃，作为历代官府所依为赋税重课的盐官，也逃得无影无踪。这下可解放了盐民，私盐得以产销旺盛，也不用缴税了，而原先享有官府特许专利的“盐引”（有营业执照的盐商）就失去了黄金饭碗，拿着“盐票”（经营盐数量的凭证）也没用了。于是，杭州城内小粉墙一带的大盐商朱恒源，就急于将十万“盐票”脱手。那时世人皆视“盐票”为废纸，以为大清王朝气数已尽，将来就是太平军的天下了。恰恰张颂贤独具慧眼，他认为食盐乃生民之日常必需品，历来是国家专营而私民不可为，眼前的混乱是暂时的，即使是太平军坐了天下，也要将私盐收为公办的，“盐票”目前不值钱，而将来必定大有可为。于是把朱家的十万盐票全部“吃尽”，使张家于丝业之外，又增加了一个“张恒源”盐号。没过几年（1864年）太平天国失败，大清王朝重新恢复官盐，“盐票”的价值一路攀升，小票值五百两银，大票值一千两银，向人出租一张“小票”一年也可赚五百两银子，张家的财富一夜间暴涨十倍，骤然成了浙江盐业巨

头,连李鸿章的亲家——江苏宜兴任家(李鸿章最小的女儿嫁给宜兴任德和,任家后代称其“九公公”、“九婆婆”的盐业,也要仰仗张家的鼻息了。所以,后来张颂贤的孙子张静江随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时,想开辟一条中法之间的贸易渠道,托孙宝琦写信给上海的实业巨擘盛宣怀,求其与之沟通,孙在信中称张静江“其家世代饶于资”,即是指此。

张颂贤的盐票后来还不止于此。据张謇为其撰写的《墓碣》(即《乌程张封公墓碣》)云:“同治初年,寇乱甫平,改引额为票运,继又规复旧章,而私贩充斥,引滞课诎,商用愈病,浙西盐法大坏矣。巡抚召商集议,令愿弃引者听,弃则悉畀公。”这就是说,在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的时候,清政府又要恢复正常盐业秩序和税收制度了,浙江巡抚曾召集过一次商业巨头的会议,而张颂贤也被召集在内,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。不仅如此,巡抚大人还看中了他的才能,要他出来参加整顿,并在会上动员各位:凡对大清“盐票”失去信心者,全部将“盐票”让给张某好了!如此一来,张颂贤有了官府的支持,更加大胆地收“盐票”,共得二十万引(一引为三百八十斤盐),成为浙江最大的盐业垄断者。

然而光有“盐票”还只是得到了官方的许可,而要真正生利,并能如数交纳盐税,就必须有效地扼制私盐泛滥,于是,他“联约诸商,变通成法,并江海、浦靖之巡为二,以分缉内地、外洋之私,并常、镇、苏、淞之厥为一,设帑引三万四千道,均于诸盐商轻课减价,以阴敌缘江并海之私。于是商利滋滋,官课以充,而公之家亦日以丰大”。可知此张老太爷,还以刚柔并济的管理才能称雄,居然成功地“怀柔”了诸商,加强了缉私,既保证了官府的税收,又使各地盐民、盐商沾利。当然,他在此垄断性的行业中成了最大的得益者,营销的范围从浙江进而发展到江苏、安徽,除了在上海九江路大庆里设立盐务总管理处(俗称“张恒源老账房”)外,还在芜湖、宣城、太仓、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镇江、宜兴、溧阳等地设立分支机构,俗称“盐公堂”(因不仅有专营引盐的各种特权,还有查缉和扣押私贩之权,故名),就使张家的家业,更加迅速地膨胀起来。

关于缉私盐(盐枭)之事,历来是件极为危险之事,历代朝

廷都是要真刀真枪地镇压的。扬州的盐枭徐宝山，曾拥有上万人的武装，与官府抗衡多年，民国后才被招抚。浙江沿海产盐区一向也是“事故多发地段”，想必不动用枪杆子也是无济于事的。那么张颂贤一个商人，何来枪杆子去对付盐枭横行呢？这真叫老天乐成人之美也，此事是他的一个庞姓亲家帮了他大忙。张颂贤的亲家公即其二儿媳（张宝善之妻，张静江之母）的父亲，是南浔另一“大象”庞云鏗，而庞云鏗恰恰是经商兼营军火的特殊商人。庞云鏗（1833—1889），字芸臬，十五岁时即去当学徒，在镇上后来成为“八牛”之一的陈熙元的陈裕昌丝行干活儿，满师后已通晓经营蚕丝的经营之道，遂从小本贩运开始，逐渐积累资本，也是一位从“辑里丝”起步发家的传奇式人物。他的两个儿子，就是在民国史上很有名气的庞莱臣（虚斋）和庞青城。庞云鏗在上海经营蚕丝的过程中，结识了杭州的“红顶商人”、胡庆余堂国药号老板胡雪岩，成为莫逆之交。胡雪岩帮庞云鏗在南浔开设庞滋德国药号，与胡庆余堂挂钩，设药栈和制药工场；而庞云鏗则帮胡雪岩在上海作蚕丝生意，他们互相合作，互补长短，极为相投。只是胡雪岩胆子比庞大得多，雄心勃勃地囤积蚕丝，立志与洋人比高低，结果误入洋人的圈套，损失巨大，几至破产，而庞云鏗只是转手代购，稳扎稳打，并无大碍。

胡雪岩在结识左宗棠之后，曾受左之托，向洋商购买军火，以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出征新疆。胡就转托庞云鏗在沪与洋人联系，从洋行进口军火。庞云鏗做成了这笔生意，从中谋得暴利，遂又开辟了一项利源。在其亲家张颂贤也需要军火时，于他来说，就更是一个顺水推舟、多多益善之事了。后来，张家、庞家这两头南浔之“象”的后代中，竟出了两位横枪越马打天下的人物，即庞青城和张静江，不知这是否与家族生活中当初的火药味有关。

文武结合、亦中亦西的治家方略

张颂贤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张宝庆（字质甫），国子监生，以后又捐得花翎候选郎中，可惜长年患病，二十来岁就得忆仲病，“沈绵不能治，卒年四十三”（缪荃孙《张封公家传》），竟先



张宝善(居中)与他的四子张墨耕(右)及孙子张乃凤

于其父五年而逝(1887年),未能继承和掌管家业,他仅有的一一个儿子即张石铭(钧衡),成为“承重”家业的长房长孙。老大多病,老二自然就肩挑重担了,所以张家第二代当家人就只能是张颂贤的次子张宝善(定甫),即张静江的父亲了。

张宝善(1856—1926)成年后即为父亲生意上的好帮手。他于举业上很不得手,仅由附贡生资格,取得一个户部贵州司郎中的名义,而实际上一天官也未当过,仅在家乡和上海料理家业。其父张颂贤1892年去世之后,他又独立操办了十年,至1903年,其兄之子张石铭三十二岁时才分家。分家后,张宝善仍居祖传老屋,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修缮、扩建,名其居曰“两枫居”,还将祖宅东侧辟为东园,与其岳丈庞云鑑的宜园相比邻(宜园今仍有遗址在,只是已荒废)。

张宝善把张家的盐业大举向纵深扩展时,还积极发展与盐有关的加工业,接连开办了张恒泰、张恒昌、张元泰、张启

泰、老裕泰等系列酱园，还在外地大开分号，经营制酱、酱油、辣酱、酱菜、腐乳等南方人喜欢的小碟佳味，几乎垄断了南浔周围方圆五十里内的酱制品的生产、批发和销售。此外，又在上海投资金融业，开典当铺，办钱庄，投资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房地产，使张家更加财源滚滚、豪气冲天了。

张宝善与一般财主不同的地方还在于，他能够审时度势、文武兼备、亦中亦西地育儿治家。十九世纪末，国内大城市内的消防设施还相当原始，而张宝善已在南浔发起建立救火队了。他花费巨资从海外进口了救火器材，又从自家酱园中挑选部分青壮年参加其中。更为不易的是，他令自己的儿子们也参加救火演习，遇有火警顷刻而出，张静江兄弟都亲自参加过救火。这支救火队，就是浙江消防史上有名的张恒和“小洋龙”。

他还热心团防，因南浔地近太湖，太湖上历来湖匪横行，骚扰百姓，张宝善便“纠合镇上富户设立团防，自是盗不入境”（蔡元培《吴兴县南浔张定甫先生墓志铭》）。其他大凡地方公益事业，他无不热心促成，如办义学，施棺材，行平粜，历为镇上百姓称颂。所以南浔镇至今有一条大街名宝善街，即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。

张宝善因自己举业不彰，就极力鼓励儿子们读书成才，非但读古书，还要读洋书。他有七个儿子，即张弁群（增熙）、张静江（增澄）、张澹如、张墨耕（增翰）、张让之（增谦）、张久香（增佩）、张镜芙（增华）。大儿子张弁群因眼疾又未能成举业，于是极力培养二儿子张静江。在张静江二十五岁的时候（1902年），他利用了亲家的关系，极力鼓励张静江到海外去闯荡，于是才有了张静江以商务随员的身份，随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之事。张静江的赴法之行，大开了他的眼界，尤其是认识了孙中山，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路，成为创建民国的元勋，从此把张家的历史，引入一个崭新的天地。归根溯源，这还得归为当年张老太爷眼光的厉害。

欲“静”而不得“静”的张静江

张静江（1877—1950），原名增澄，又名人杰，号饮光，别号

张静江先生



卧禅，佛名智杰。因在家行二，所以乡人多称他为“二先生”（南浔方言“二”读“义”，所以听起来就是“义先生”）。他的祖父张颂贤很喜欢这个孙子，认为他的“八字”好，日后必成大器。但他命中有一缺憾，即“五行”中独缺水，说是注定要一生苦于奔波，所以给他增加“水分”，而取名“增澄”。又为了减少他一生的奔波而起字“静江”。然而一切命中注定的事似乎是无法改变的，张静江一生中重大的几件事，恰恰都与水有关，越是“增澄”就越是风波不定。而且他的确是一生都在奔波，并且常常是奔波在互为矛盾的事物中。

他十八岁时（1894年），有一次乘船去上海，在船到平望过桥洞转弯时，大概船触桥墩致使船漏，进而船身倾斜下沉，船上不少人落水呼救。张静江是张家二少爷，得船主之助，爬上了船的顶篷，但他一听舱内还有人呼救，就朝岸上大呼：“谁能救出一个人，我赏他一百两银！”四乡八邻都知张家的财气，更知二少爷一向说话算数，于是纷纷下水救人，有数十人因此得救。张静江为家乡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，他不仅大难不死，

反而因救人而名声大振。救人者立即获得了报答，其中有两人同时救出一人的，这两个人均得一百银。对于船主，张静江更是仁至义尽，此后每年过年就送上二百银元，直到他去法国为止。这是张静江第一次与水有关的大事。

后来张静江结识了孙中山先生，走向了革命，以其开展中法间的贸易所得巨款捐助国民革命，也与水大有关系，这主要是指发生在轮船上的事。1905年至1907年，张静江东归，常往返于香港、新加坡、上海之间，进行贸易活动。有一次在乘船去香港、新加坡购买印刷器材的时候，恰逢孙中山先生也在这条法国轮船上，他们在船上邂逅相谈，一见如故，彼此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。张静江当即对孙中山表示，本人近年在英法间从事商贸，获利颇多，如果革命需要，随时可以捐助，并约好以“A、B、C、D、E”五个字母，代表所需经费的数额，A代表一万，E即代表五万。从那时起，张静江的钱袋就不断地投向了革命，此为后话。自然，他一生的奔波，也自此开始了。

中国人大赚法国钱的第一人

张静江居乡时原本一公子哥儿，据其弟张久香在《二兄行述》中回忆：“二兄幼时，性殊顽劣，而异常童”，“二兄好弈，于燕寝之余，围棋解闷，兄弟相与抵掌论列是非。”又说他好交友，尚豪侠，喜冒险，故以“人杰”自名。但他真正出人头地，使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得大名的，还是在他远赴法国之后。

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张静江以随员的身份，随同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。这一千载难逢的机缘，最初是他的丈人、前清翰林、山东学台、苏州人姚菊岐（丙然）给“搭的桥”。姚菊岐是高阳相国、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门生，与李鸿藻的另一门生黄思永（慎之，北京工艺局总办兼英文学校校长）为同年。有一年黄思永摆宴请客，张静江随同岳丈同趋，遂在宴席认识了黄氏父子及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（煜瀛）。张与李石曾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，于是订交，时间约在1900年左右。两年后，李家邻居孙宝琦（字慕韩，曾任直隶道台。其父孙诒经是光绪帝师之一，曾任户部侍郎，又佐度支部达十年，亦清末

重臣。)将赴法履职,李石曾因其父与孙氏之父均为清廷旧僚,又是邻居,遂得以随员身份随同赴法。然而事被张静江得知后,绝不肯放过这一良机,于是通过李石曾央告孙宝琦,要求带他同去。孙宝琦好好先生一个,从不愿得罪人,又素闻南浔张家贤达,于是带一个也是带,带两个也是带,就都答应了下来。于是孙与李等人于1902年8月29日从北京出发,转道天津到上海,再带上张静江上路。而张静江则一不做、二不休,索性又带上一个助手周菊人同去,拉拉杂杂的这支公使队伍,最终共达二十余人,总算于10月14乘上法国邮轮“安南”号,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后,到达马赛,再换乘火车,于12月17日到达巴黎。

到巴黎后,李石曾要读书,入蒙达顿我农校,毕业后又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,从事学术研究;而张静江则热衷实业,很想以巴黎为基地,亲自从事中法间的贸易,并决心开拓欧洲市场,与势头强劲的日本人一比高低。居法一年后,他已了解了欧洲市场上的大致状况,决定招股成立一个贸易公司,依照外国洋行的样子,把中国的丝绸、茶叶、瓷器、文物等从中国廉价收购,运到法国卖大价钱,于是他第二年底回国办理招股集资。可是那时国内华人自办海外贸易的风气尚未大开,就中法民间贸易而言,只有法国人到中国来办公司、开洋行,还从未有中国人到法国去开商行的,所以人们不敢贸然投资,应者寥寥。最后,还是他父亲支持了他,给了他三十万银元,使他终于在巴黎办起了独资的商行即通运公司,地址在巴黎马德兰广场4号,开中国人做法国人生意之先河。通运公司最初只是运销生丝和茶叶,后来发展到绸缎、地毯、漆器、竹器、牙器,以及名贵的古董、字画、玉器、瓷器和青铜器,于是生意大旺。加上那时法国的关税制度,对于一切古代文化艺术品,给予免税进口的优惠,中国文物在欧洲市场上又很走俏,这就更加刺激了张静江的胃口,所以在文物和艺术品的经营上,就狠下了一番功夫,使他财运大发。

有一次他手下的人在山西某地,用十元钱买了一只宋代的瓷钵,运到法国后很快就以一万美金脱手。又有一次在宁波某寺院,他的在国内“收货”的人,花了三百元,向一僧人买了

张静江与其元配
夫人姚蕙



一个身高1米的白瓷兰彩的观音菩萨像，其瓷质的细洁、色彩的亮丽、造型的生动，世间罕有其比。此菩萨是寺中之宝，经办者深恐此事被人发觉而阻止运出，就于得手的当夜急急运至上海，又乘最近的一班轮船运往美国。这个白瓷观音一到纽约，当即就有人出价二十万美元收购。而张静江的心还要“狠”，非五十万美元不卖。现在这个白瓷观音被收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内，进该博物馆时是何价格就不得而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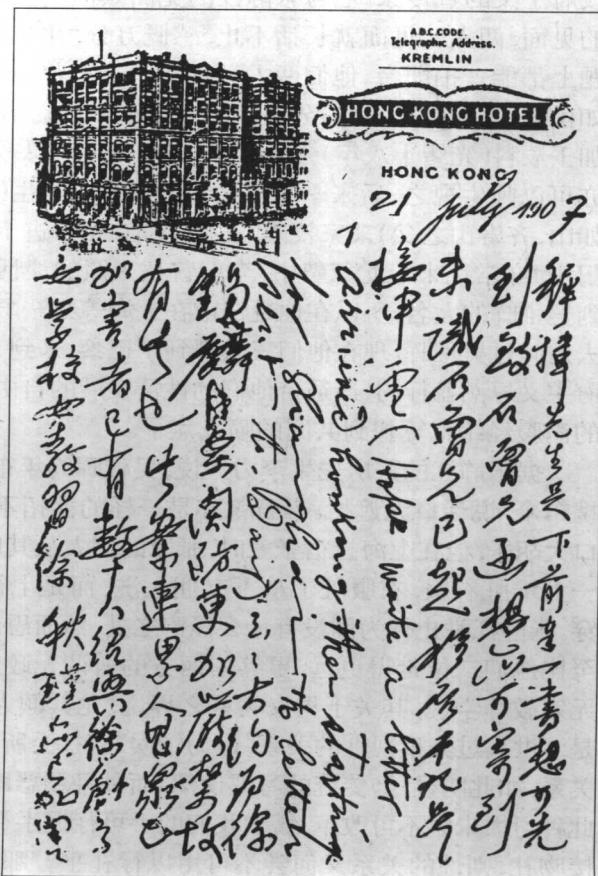
通运公司后来在纽约和伦敦都设有分公司。纽约公司的经理是张的妻弟姚叔莱。通运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设在南京东路的鸿仁里，即张的同乡、南浔刘家三房的老根据地。他的不少亲戚和同乡都是他的重要帮手，如其舅父庞莱臣，是国内数得着的大收藏家，正可以当他的供货参谋；其同乡蒋孟蘋、周佩箴、薛竹荪也都曾积极参与其事。

后来，通运公司的茶叶部业务一再延伸，在巴黎繁华的意大利大街上开设了一家开元茶店，其陈设之豪华、民俗风情之浓郁，在巴黎首屈一指，成为当时人们到巴黎旅游观光的必到之处，最后竟发展成巴黎知识界，尤其是西方汉学家们的聚会场所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级沙龙。那时张静江得天独厚之助，不仅货源充足，而且每两个月可销出一批货，一年可周转六次，其获利之巨，可以想见。张静江经营头脑极为灵

活，他甚至还趁法国牛奶涨价、供应紧张之际，开办了一家豆类加工场，供应价廉物美的豆浆，结果大受欢迎。总之，张静江在巴黎的确旗开得胜，钞票不知赚了多少，成为中国人大赚法国人钱的第一人。用他的账房先生李力经的话来说就是：“获利之巨，无法估计。”

旅法华人的“三剑客”

人的命运常常因一些意想不到的偶然因素，而变得异彩纷呈、波澜壮阔起来。张静江一生的命运就和他的几次奇遇大



清光绪三十三年
(1907)七月张静
江先生致吴稚晖
先生手札